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分析史

第一卷

〔美〕约瑟夫·熊彼特 著



F2
44
1

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分析史

第一卷

〔美〕约瑟夫·熊彼特 著

朱 泱 孙鸿敞 译
李 宏 陈锡龄



商务印书馆

2001年·北京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分析史

第一卷

[美] 约瑟夫·熊彼特 著

朱 泱 孙鸿敬 译
李 宏 陈锡龄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 - 100 - 02209 - 6/F·253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1 年 11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张 19

印数 5000 册

定价: 24.00 元

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Eleventh Printing, 198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本书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第 11 次印刷本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2年先后分六辑印行了名著二百六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七辑,到1997年出版至30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4年3月

中译本序言

张培刚

(一)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年),是美籍奥国经济学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经济分析史》是熊彼特生前将待完成的遗作。熊彼特于1950年元月去世后,本书英文稿由其夫人伊丽莎白·熊彼特率领多位助手加以整理编辑,积数年之艰辛努力,除部分索引未编完外,全书已告完成。这时,其夫人亦因积劳成疾病故。1954年本书英文本首次出版。全书1260页,可说是迄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说史,特别是关于经济分析方法的演变方面最广泛、详尽,而追根溯源又比较深透、分析评论又多具特色的第一本巨幅专著。书出后连年再版,并译成多种文字,畅行于国际经济学界。1980年英文本已出至第十一版,现在的中译本就是根据这个英文版本进行翻译的。

《经济分析史》也是熊彼特的五大名著或代表作之一。其他四本著作,无论在思想观点上或在方法论上,均与最后一本问世的巨著《经济分析史》有密切关联,故值得提出,以供参阅。如按出版年代的顺序,第一本主要代表作,同时也是熊彼特的早期成名之作,是1912年以德文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因在书中首次提出“创

新理论”而一举成名。1934年,美国哈佛大学根据德文修订版出了英文本,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46卷;同时还译成了意、法、日文和西班牙文。中译本已于1987年上期完稿,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二本是1939年出版的英文本《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全书两大卷,共1100余页。据熊彼特的同事好友哈伯勒(G.Haberler)评价,此书是“一座体现了理论上敏锐博识、苦心钻研学者风度,以及执着追求精神的丰碑”。(见他悼念熊彼特的长文章,载于英文《经济学季刊》,1950年8月号。)但全书篇幅冗长,我预计短期内难以有中译本出现(就我所知,至今只有日文译本出版)。为此,我们曾征得商务印书馆的同意,特将熊彼特1935年所写的体现了《经济周期》两大卷巨著主要思想前驱的“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译成中文,放在上述熊彼特所著《经济发展理论》第六章“经济周期”之后,作为“附录”一同发表。这样,读者就可以从中获得关于熊彼特的“多层次的三个经济周期理论”的概貌。

第三本是1942年出版的英文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出版后即成为“畅销书”;1947年增订再版;1950年增订第三版,并增添一章,题为“长驱直入社会主义”。本书早已译成了德、法、意、日、西班牙文;中译本亦已于197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四本是《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亦由伊丽莎白·熊彼特于1951年,根据作者生前从1910年到1950年元月以德文或英文所写的传记和评论,加以翻译、整理和编辑而成,于

1952 年以英文出版。中译本已早于 1965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五本便是熊彼特最后的主要代表作《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从“文革”前就开始组织中译,比如复旦大学已故经济学家吴斐丹教授和南开大学已故经济学家丁洪范教授都曾参与其事,后因发生“文化大革命”而中辍。“文革”后,商务印书馆又另行组织人员,从事本书的翻译工作。现在这一部篇幅浩繁、内容广泛而又艰深的巨著,经过译者、校者和主持其事者的数年辛劳,终于以 130 万字的中译版本,分卷与我国读者见面了。这是我国学林值得欢迎和庆幸的一桩大事。

在组织和出版熊彼特主要著作的中译本方面,商务印书馆以及主持和亲身参与其事的胡企林、吴衡康、朱泱三同志,从事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进行了“无名英雄”式的组织和编辑校订工作。特别是像《经济分析史》这样难译难校的巨幅专著,也最终有赖于他们的这种坚持不懈的执着精神,而能以比较通达的中文形式,出现于中国经济学界的译述园地。至此,当代西方经济学大师熊彼特的主要代表性著作,除了个别者外,都已相继以中译本出版完毕。作为以上各书的译者、校阅者和组织编辑者,实在是功莫大焉。

(二)

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不同于一般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为了深入理解这种不同之处,以及《经济分析史》在写作意图上和写作方法上的特点,我们必须先简要了解熊彼特的生平、学识渊源和治学之道。

熊彼特于 1883 年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故有人又把熊彼特看作美籍捷克人)特利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 年肄业于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乃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尔(Otto Bauer),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通过这些人,他受到马克思学术观点的影响。迨后他游学伦敦,就教于马歇尔;但终其一生,他极其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熊彼特曾执教于奥国的几个大学。1918 年,他曾一度出任由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的经济顾问;1919 年,他又短期出任由奥托·鲍尔等人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参加组成的奥国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1921 年,他弃仕从商,任私营比德曼银行(Biedermann Bank)行长,1924 年银行破产,他的私人积蓄亦不得受牵连而用于偿债。1925 年,熊彼特又回到学术界,先应邀拟赴日本任大学客座教授,但不久改赴德国任波恩大学教授,直到 1931 年才又短期践约访日讲学。1932 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 1950 年初逝世。熊彼特迁美后,尽管深居简出,但仍积极从事学术活动:1937—1941 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1949 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还会担任预先商定的即将成立的“国际经济学会”第一届会长。

从熊彼特的上述学历和工作经历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直接承袭了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学说体系;另一方面又

与第二国际首脑人物、社会民主党人有过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些人的影响和阅读书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观点,也有了较深的理解。这些阅历,对于熊彼特的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经济学说的形成,可说是极其重要的渊源。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里,如同在他的其他重要著作中一样,重视甚至更加强调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以及它们的演变和发展。他之所以把本书当作“经济分析史”来写,而不是当作“经济思想史”来写,主要原因也正在这里。熊彼特曾在 1949 年初给他的英文文本出版商简要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本书将要描述从希腊—罗马时代直到今天在经济领域里科学分析的发展和成果”;又指出“本书的主题就是关于描述和解释经济事实并为从事此项工作提供各种工具所作的种种努力的历史”。(详见本书开头:熊彼特的夫人伊丽莎白为本书所写的“导言”。)

综观熊彼特在他的经济著述中的方法论,概括而言,它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强调发展观点和内在因素。熊彼特尽管不同意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但是他对于在分析问题时强调要采用“变动”、“动态”、“发展”的观点,以及强调要认清“发展”现象是来自事物“内在因素”的作用这个方面,则极力推崇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认为这“完全是他(马克思)的创见”。伊丽莎白·熊彼特则认为这个方面是熊彼特和马克思的“共同之点”。(见伊丽莎白为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所写的前言,载于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2 页。)我们认为,在这个方面或在这一观点上,熊彼特很可能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两者所采用的“发

展”观点,确有某些相同之处;但从根本上说,则又大不相同。马克思的发展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用在社会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的。而熊彼特虽然也采用了“发展”观点,在这一点上熊彼特可说胜过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但他的“发展”观点是并不承认社会制度的“突变”等等。不论怎样,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一书中,自始至终是以对经济的科学分析为中心线索,并十分强调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的演变和发展的。

第二,强调并采用历史的方法。熊彼特早在1914年就以德文发表了短篇著作《经济学说与方法史略》(台湾经济学者阎子桂曾根据英译本译成中文,书名为《经济学说和方法——历史的概述》,于1972年由台湾中华书局出版),这就是现在的巨幅著作《经济分析史》的前身和雏形。这大小两本著作,说明熊彼特从青年到老年都一直重视经济学说和方法的发展史的研究。不仅如此,而且在熊彼特的其他几本最有代表性的围绕“创新理论”而建立他自己的学说体系的著作,即《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三本著作里,熊彼特都明显地采用了历史分析方法,并始终意图把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二者结合起来。这种意图和作法,在《经济分析史》里以及在传记著作《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里,也是有明显的体现的。熊彼特总是试图把不同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不同分析工具的产生和运用,与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背景联系起来。总之,熊彼特无时无刻不是试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探究二者融合在一起,从而不仅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的经济学说体系,而且也形成了他自己的颇具特色的分析方法。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史学家厄谢尔(A. P. Usher)曾在一篇悼念熊彼

特的文章里写道：“他把不同的分析工具加以综合运用，是具有高度创见性的。”“当时除了马克思文献的领域外，实难以见到这种有成就的综合运用的分析工具。”（见 A.P. 厄谢尔：《经济发展理论的历史意义》，载于 H.E. 哈里斯主编的《熊彼特——社会科学家》英文本，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125—129 页。）

第三，强调追根溯源，查明来龙去脉，重考据和历史事实，治学严谨，注解详明。熊彼特的这种求实态度和作风，几乎见于他所有的长篇著作或短篇论文中；在《经济分析史》这一巨幅著作里，尤其是这样。对于本书中涉及的某人、某事、某种著述、某种学说、某种分析方法或分析工具，熊彼特无不力求对其历史渊源和发展现状，旁征博引，阐述清楚，并加以必要的评论。有时在正文里不能尽其详，则辅之以详细的注解，务求把事实弄明白，或把问题搞彻底。对于一本著作，如果有一种或几种其他文字的译本，则必然在附注里注明其各种文字的译者、出版地点和出版年份。熊彼特的这种做学问的踏实作风，是值得我们赞许和效法的。不仅如此，有时熊彼特在本书中对某一个经济学者的附注，就包括有这个学者的生平、著作和学说要义，以及他在经济学界的影响或贡献，最后还加上熊彼特三言两语的评论。所以我们阅读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必须同时仔细阅读书中的注解，这些注文不仅读来饶有兴趣，而且往往能为进一步钻研某个问题找到深入堂奥的阶梯。这无论是对西方经济学史的初学者，或是对专业研究者，都将是有益的。

（三）

常言道：“文如其人”；推广而言之，我们也可以说：“作品亦如

其人”。《经济分析史》涉猎的范围可说是空前的广泛和丰富：从时间上言，上下两千余年，从公元前数百年的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提到大约同期的古代中国的孔子和孟子）直到今天的凯恩斯、萨缪尔森；从地域上言，遍及欧、美、亚各大洲。并且，书中对涉及的人物、学说和方法，如前所述，无不追根溯源，详加分析并给以适当评论，使陈述的问题达到相当的深度。本书在内容范围和方法论上的这些特点，正体现了作者熊彼特的博学多识，以及执着求实求真的精神。现在再将本书的主要特点，简要阐述如后：

第一，熊彼特写作《经济分析史》，据其夫人伊丽莎白说，花费了他一生的最后九年时间，即从1941年到1950年元月8日去世之前；但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也可以说花费了他一生的全部时间。根据伊丽莎白的说法，几乎熊彼特一生的所有著述和所有教课，都为《经济分析史》的完成作出过贡献。例如，早在1911年，当熊彼特还是28岁时，已经在奥地利东部的切诺维兹（Czenowitz）大学担任了两年教授，曾讲授专题：“社会科学的过去与未来”，后来扩大而改写成为1914年出版的德文本《经济学说与方法史略》，也就是现在的《经济分析史》的前身和雏形。又如，1948年12月熊彼特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所作的会长演说词，题为“科学与意识形态”，就涉及方法论上的一些问题，后来便成为《经济分析史》第一编所探讨的部分内容。再如，1941年到1945年，我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经济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时，在读了E. 张伯伦的“经济学”课程之后，就选读了熊彼特的“高级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课程；熊彼特所讲授的内容，后来便成为现在的《经济分析史》第四编，特别是其中第七章“均衡分析”，以及第五编关

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所探讨的主要对象。熊彼特的上述这两个课程,包括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着重讲了李嘉图;又包括德国新、旧历史学派,还包括杰文斯、门格尔、庞巴维克、瓦尔拉等人的边际分析,尤其着重讲了瓦尔拉、帕累托的一般均衡分析,及其与马歇尔局部均衡分析的比较;还谈到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以及数理学派和计量经济学;并且多处谈到了马克思的学说体系,马克思与李嘉图的比较,马克思“进化论”与达尔文“进化论”的比较,以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等等;在现代经济学领域里,还特别谈到了瑞典学派的威克塞尔,谈到了厂商理论和垄断竞争理论,谈到了凯恩斯与宏观经济学,以及宏观动态学与经济周期变动等等。对熊彼特的这些课程以及我在哈佛大学选读的其他课程,我都有详细的笔记,合计起来有将近三十本之多,可惜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连同我的上千本外文书刊,都已毁于一旦。

此外,熊彼特在二十年代后期,曾在德国波恩大学主讲“财政学”课程;三十年代初期他去美国哈佛大学任教后,一度在耶鲁大学讲过“国际贸易”;四十年代后期,又在哈佛大学讲过“社会主义”。

与讲课一样,熊彼特的写作范围也是很广泛的。除了前述几种代表作外,他还写有不少的有关经济学科各个领域的专著和论文,而书评、传记、短评尤多。上述《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一书,只不过选辑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又如,熊彼特早在1906年,当他还只有二十三岁时,就以德文写过“论理论经济学的数学方法”一文,呼吁在经济理论中使用数学方法,发表于当时奥国有名的德文杂志(《国民经济、社会政策与管理杂志》,第15卷,1906

年版)。四十年后,到了1946年,当他已经年逾花甲时,又与哈佛同事统计学教授克鲁姆(W. L. Crum)合写了薄卷英文本《经济学家和统计学者需用的数学初步》一书(纽约1946年版,共计183页),对于在经济学中推广使用数学,起了积极作用。这也说明熊彼特对西方经济学界即将涌起广泛应用数学方法高潮的预感是很敏锐的。

概言之,所有上述熊彼特一生中的教学和写作,包括各个学派人物、学说、分析方法及其演变情况,都汇集到了《经济分析史》一书里,成为它的浩瀚内容。

第二,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又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凡是应该涉及的不同人物和学说派别,以及各有特色的分析方法和所用工具,一般来说,熊彼特无不尽量包罗,加以描述和评论。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认为熊彼特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存有偏向。例如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R. 希克斯就认为熊彼特对英国经济学传统缺乏热情;其所以如此,则是根源于他身上的“奥地利遗风”,表现在强调“贸易论”胜过看待生产上的“真实成本论”。希克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还可以从熊彼特的那本伟大著作《经济分析史》里找到另一例证。熊彼特本来有无数途径可以用来加深对经济学家(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前辈)所作所为的理解。但是事实上却不能不使我们注意到,他经常是从对交换或贸易意义上的经济学的贡献大小,来评判经济学家。只有那些强调‘贸易论’的经济学家(比如杰文斯、瓦尔拉和门格尔,以及他们的前辈如杜尔阁和萨伊)才获得他的特别赞扬;而对另外一些应当看作是更大的人物(比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马歇尔和庇古)

却被他看待得不那么重要了。为什么他要贬低他们？这是因为他们属于别的派系。”（见 J.R. 希克斯：《福利经济学的范围和地位》，载于《牛津经济文献》1975 年 11 月号。）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基希（Herbert Kisch，已于 1978 年去世），除了赞扬《经济分析史》是一部“功力深厚”的学术巨著外，也说：“在《分析史》里，熊彼特的个性和偏见，比他的任何一本其他著作，都更加显露出来：例如他对英国经济学家，特别是对那些生前已得到公认的经济学家，所具有的爱憎关系”。（见 H. 基希：《约瑟夫·熊彼特》，载于《经济问题杂志》1979 年 3 月号。）

希克斯和基希持有的熊彼特怀有“对英国经济学传统缺乏热情”这种“偏见”的看法，固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熊彼特也有他不得不这样对待的原由，而且事实上，他也不完全是像希克斯所说的那样持有偏见的。

首先，熊彼特是非常崇敬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的。例如，他在《经济分析史》里讲到“亚当·斯密和《国富论》”时，就曾这样写道：“尽管如此，似乎仍有必要停下来看一看这位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以对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个了解，并似乎有必要看一看他的《国富论》，该书不仅是最为成功的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或许除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外迄今出版的最为成功的科学著作。”（见《经济分析史》英文本，1980 年第 11 版，第二编第三章第 4 节，第 181 页；中译本，第一卷，第 275 页。）像这样地推崇亚当·斯密和他的著作《国富论》，可以说是在普天之下高得不能再高了，怎么能说熊彼特对英国经济学界的每一个学者都持有“贬低”的“偏见”呢？

其次，我们都知道，英国经济学界，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

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以来,中间经过马尔萨斯、大小穆勒,直到杰文斯、马歇尔和庇古,最后到凯恩斯,确实对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作出过很大的贡献;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功绩尤大,它不仅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更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在学术史上是光辉永存的。但是,英国传统经济学中往往有一些学者居功自傲,自视甚高,似乎“天下第一”,舍我其谁?殊不知天外有天,英国经济学家固然贡献很大,但在欧洲大陆,如法国重农学派的大经济学家魁奈、杜尔阁,德国的大经济学家李斯特和新、旧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的大经济学家门格尔、庞巴维克,洛桑学派的大经济学家法人瓦尔拉和意大利人帕累托,瑞典学派的大经济学家威克塞尔,以及在美国,与欧洲边际学派很有关系的大经济学家J.B. 克拉克,与德国历史学派颇有渊源的制度学派大经济学家凡勃伦、J.R. 康芒斯,等等,也都对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像熊彼特这样的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在欧洲大陆受过文化教育熏陶的经济学者,对英国经济学界的那种瞧不起他人的傲气,自然看不惯,因之在讲课的言谈间,或在写作的字里行间,有时对英国经济学传统流露出冷淡或不热忱,也是合乎情理而不可厚非的。

再者,现代西方撰写“经济学史”的经济学者,在他们的作品中大都详于本国,而略于它邦;英、美出身的学者是这样,欧洲大陆出身的学者也是这样。例如,有两本书曾经流行甚广,长期作为大学经济学史教材。一为欧洲大陆的法国人季德和里斯特所写的法文本《经济学说史》(初版1909年,第7版1947年;有英译本;又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内容丰富,知识广博,可惜叙事只到